

揭示教育腐敗背後的心理機制： 道德疏離的角色與作用

李惠雯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腐敗泛指教育系統中濫用職權以謀取私利的行為（Heyneman, 2014），不僅侵蝕教育公平與正義，更削弱公共資源的有效運用，破壞師生關係與學習環境，對整體教育體系造成長遠影響。台灣近年幾起教育領域的新聞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例如，2024 年某大學前總務長林姓教授被控利用職務之便，將校內多項工程標案內容洩漏給胞弟經營之科技公司，協助其順利得標，遭檢方依貪汙罪起訴（中央通訊社，2024），另有某科技大學王姓、唐姓兩位教授涉嫌收受學生金錢賄賂，協助學生撰寫碩、博士論文，並護航通過學位考試（中央通訊社，2024），以及某大學行政組員監守自盜職務所保管之禮券，遭高雄高分院判刑（中央通訊社，2024）等新聞案例。

在當代社會中，貪腐問題已不再侷限於政經領域，其觸角亦逐漸延伸至教育系統，過往研究多聚焦於制度層面與法規對策之探討，對於個體層次中道德判斷與心理機制的理解則相對不足。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從社會互動觀點提出道德疏離（Moral Disengagement）理論，用以說明個體如何透過一系列認知機制來合理化不道德行為，藉此減輕道德壓力，最終促使不道德行為的產生。Bandura 認為，道德行為的驅動來自於個體自我反省與自我調節機制，然而，當這些調節機制因道德疏離作用而失效時，個體便可能透過認知扭曲解除道德約束，將不當行為合理化為「可接受」或「無害」（Bandura, 1999）。

目前國內針對教育領域的道德疏離研究相對有限，本文擬以此理論為基礎，探討其於教育腐敗現象的應用潛力，透過梳理道德疏離機制之內涵，並從相關實證研究中萃取啟示，期能為國內教育倫理與反貪腐議題提供理論借鏡與研究方向。

二、道德疏離機制之內涵

Bandura（1990）指出，道德疏離是一種認知重構的過程，藉由扭曲道德事件的認知，使行為者得以將不道德行為與應負責任切割，進而逃避道德譴責。他提出多項道德疏離機制，這些機制使個體將焦點轉移至非道德層面，藉以調整對自身行為的認知評價，進而降低罪惡感，並為不當行為提供正當化的心理依據。以下分述其主要機制：

（一）道德辯解（Moral Justification）

此一機制意指行為者將原本不道德的行為包裝為服務「更高的道德目標」，從而使行為合理化（Bandura, 1999）。例如，貪污者可能以「照顧親友」或「促進公共利益」為理由，為自身行為辯護（余一鳴，2016；陳永鎮，2017）。

在軍事或教育領域，道德辯解機制常被用來將暴力或不正當手段轉化為國家或組織利益的追求。余一鳴與顏志龍（2011）指出，軍事社會化程度對道德疏離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道德認同在其中扮演調節角色。對道德認同較低的軍校生而言，軍事社會化將提升其道德疏離傾向；對認同程度較高者則無此效果。

在教育實務中，Miller 等人（2019）透過訪談九位終身職教師，發現高等教育機構中普遍存在以道德辯解策略來合理化學術暴力與霸凌行為的情形。Gino 與 Pierce（2009）亦指出，當人們認為其不道德行為出於「更大的目標」或「更高的善意」時，更容易參與此類行為，例如實驗參與者可能以「為了團隊」為由，合理化作弊行為。

（二）委婉語言（Euphemistic Language）

委婉語言是指透過修飾或模糊措辭，淡化不道德行為的真實性質，藉以降低行為者的道德警覺，使行為更易被接受。在教育領域中，委婉語言常被用來美化不當行為，掩飾其實質傷害。Miller 等人（2019）發現，在高等教育中，學術暴力與霸凌行為經常伴隨委婉語言與道德辯解而出現，使加害行為看似正當、理性。

余一鳴（2012）亦指出，在台灣受華人關係主義影響的公部門環境中，私人交情常被視為協調手段，使得涉及貪腐的行為，如收受禮品或回扣，能以「人情往來」包裝，進而淡化其道德性質。在實務上，例如警察接受與其業務有關之業者的餽贈，常以「禮尚往來」或「不得已」為由，進一步降低自我批判的道德壓力，使貪污或圖利行為合理化，甚至內化為一種社會常規。這種語言策略，不僅使行為者逃避道德譴責，也模糊了組織文化中正當與不正當的界線。

（三）有利比較（Advantageous Comparison）

有利比較是指行為者將自身的不當行為與更為惡劣的行為相比，藉此淡化自己的行為後果，降低內心罪惡感（Bandura, 2002）。當行為者將自身的錯誤視為「相對輕微」，便更容易接受甚至維護此類行為。

例如，一名涉貪警察可能認為「別人貪得更多」，從而合理化自身行為（Dombrink, 1988）。在教育現場，教師可能藉由與更極端的體罰行為相比，來合理化其過度懲戒行為（Kelchtermans, 2009），如認為「至少我沒有打他們」，

進而忽視自身作為仍可能造成傷害的事實。

此外，在資源有限的教育體系中，學校管理者可能傾向將資源集中於「績優學生」，以追求整體績效提升，此舉雖可能被描繪為「務實管理」，實則忽略弱勢學生需求，透過與「資源完全缺乏」的情況進行比較，使不平等政策顯得合理（Bandura, 2002）。

總體而言，有利比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心理策略，透過相對化思維模糊行為界線，使個體逃避道德監督。這種策略不僅影響個人層次，更可能在群體與制度層面上形塑容忍不當行為的文化氛圍。

（四）推卸責任（Displacement of Responsibility）

推卸責任機制指行為者將不當行為的責任歸咎於外在力量，如上級命令或組織指示，以削弱自我責備並減輕道德壓力（Bandura, 1986）。當個人或機構面臨決策責任時，經常透過模糊責任、將問題歸因於他人或外在條件，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此現象在高度服從的官僚體制（如軍隊）中特別普遍。

例如，Bandura 等人（1996）曾指出，若民眾遭遇恐怖攻擊後以報復之名行使暴力，常會將該行為視為應有之義，甚至賦予正面價值。Moore（2008）亦發現，在組織中，員工若認為自己只是執行上級指令，便能大幅降低內在道德譴責，最終在「奉命行事」的包裝下行使不當行為。

在教育場域亦不乏類似案例，行政人員或教師若因上級壓力而進行不當決策，往往可透過「只是服從指令」來推卸個人責任。這種心理機制使個體在道德監督上更為鬆懈，為教育腐敗或其他違規行為提供了發生的空間。

（五）責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在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架構下，群體決策的共享性往往削弱個體對不當行為的責任感，也降低個人對道德警覺的敏銳度（Bandura, 2002）。許多組織會採用責任分散策略來分擔或淡化不利後果。例如，胡佳吟（2005）對警察收賄的實證研究發現，在特種行業中，業者每月固定向轄區派出所行賄，大多數警員坦然收受，而拒絕者則可能面臨被排斥的風險。這種氛圍易催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做」的合理化心理（施嘉文，2010），促使個體加入不當行為的行列。

Bandura 等人（1975）指出，團體壓力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當不道德行為由組織推動並分散責任時，個體更易逃避道德譴責，反而將重點轉向強調團隊合作或組織利益，導致貪污等不當行為更可能被默許、乃至逐漸常態化。這種動態不僅削弱了個體的內在道德控制，也助長了組織內部不道德行為的系

統性擴散。

（六）忽視或扭曲後果（Disregarding/Distorting Consequences）

此機制指行為者透過淡化或曲解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降低內在道德壓力（Bandura, 1986）。當行為結果被視為過於殘酷或違反社會規範時，行為者往往會調整對後果的認知，使其看似符合個人道德信仰或社會期待。一旦刻意扭曲行為與後果之間的關聯，原本應受譴責的行為便容易被合理化。

例如，施暴者可能將暴力及其造成的嚴重傷害歸咎於受害者本身，或推卸給環境因素（Bandura, 1990）。Mazar 等人（2008）則發現，在小規模作弊情境中，行為者往往低估或忽視對他人和整體公平性的衝擊，更專注於個人所獲得的微小利益，因而淡化不誠實行為的嚴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Thornberg 等人（2023）研究校園霸凌旁觀者行為時指出，當學生的道德疏離程度較高時，更易採取被動立場，且不願為受害者發聲。這項結果顯示，若能提升學生的道德參與與內在動機，則更能促進旁觀者的積極干預，避免忽視或扭曲後果的現象持續蔓延。

（七）責任歸咎（Attribution of Blame）

責任歸咎指行為者將不當或有害行為的責任轉移至受害者或外在環境，藉此脫罪並維持自身「清白」的形象（Bandura, 2002）。加害者通常認為錯不在己，而是受害者挑釁或外部情勢造成。

Dunfee 和 Warren（2001）對中國商業情境中的「關係」（guanxi）進行規範性分析時指出，部分關係模式與貪腐及賄賂行為密切相關，尤其在「紅包文化」的情境下，行賄者主動提供禮金，受賄者則以「禮俗」為由被動接受。此舉不僅降低了受賄者的罪惡感，也將責任歸咎於行賄者的主動性，進而使貪污行為更易被合理化。當公共職務人員因社會習俗而接受餽贈時，若將責任推給「人情往來」或習俗期望，便降低了個人對道德違失的自我警覺，長期下來助長腐敗的蔓延。

三、國內應用研究現況與啟示

道德辯解、委婉語言以及有利比較等機制，均能讓個體脫離自我制裁，將原本不當的行為合理化。例如，教師可能以「為了學生或學校利益」為由接受賄賂；學術不端行為（如抄襲、作弊）則可能因責任分散或有利比較的影響而被正當化；校園霸凌者也常抱持「其他人也在做」、「沒什麼大不了」、「活該」等心態。再者，當責任經由分散或推卸而模糊個人在不當行動中的角色時，更易助長違規行為。若個體忽視或扭曲非人道行為的後果，或進一步將責任歸咎

於受害者，自身的道德自律將受到嚴重侵蝕，導致校園中各類不當行為的蔓延。在此背景下，僅憑個人道德意識無法有效防範此類現象，校園與整個社會都必須建立完善的防範機制及輔導措施，以遏止這些道德疏離機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鑒於當前教育場域中對於教育貪腐現象的關注仍多著眼於法規層面與行政懲處，對於教育從業人員如何在心理上逐步接受、合理化甚至參與違規行為的歷程理解有限。本文認為，學術界對此現象之理解多侷限於制度與法規的框架，缺乏對教育從業人員在面對違規情境時「心理如何運作」的討論。「道德疏離」不僅是解釋教育腐敗個案的重要心理機制，更有助於政策制定者重新反思教師專業倫理、學校組織文化與制度鬆動之間的交互作用，俾例針對各項疏離機制之運用提出相應的防治策略。事實上，制度設計再完善，尚需個體認知與判斷共同維持。本文主張，若未正視教育人員在違規行為中的道德疏離歷程，將難以從根本改善校園腐敗與不當行為之蔓延。

回顧國內相關研究，余一鳴（2012）編譯並探討了 Bandura 等人（1996）所編製的道德疏離機制量表於國內學生之適用性，結果顯示該量表在本地學生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作為衡量道德疏離的重要工具，透過這些機制，個體能夠在心理上減少對貪腐行為的道德壓力，進而更容易參與此類行為，若組織文化或制度未能有效制衡，這些道德疏離機制可能被制度化，導致組織整體的腐化。此外，賴怡君與程景琳（2020）則更進一步聚焦於教育脈絡，指出小學生的同理心與捍衛者行為傾向呈正相關，與局外者及助凌者行為傾向呈負相關；而道德疏離與捍衛者行為傾向呈負相關，與局外者及助凌者行為傾向呈正相關，該研究運用了以下道德疏離機制來解釋這些行為傾向，例如學生可能認為在群體中，自己對欺凌行為的責任較小，因此不主動介入（責任分散）；學生可能低估欺凌行為對受害者的傷害，認為其後果不嚴重（忽視或扭曲後果）；學生可能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認為受害者的行為導致了欺凌的發生（責任歸咎）。

這些機制有助於理解學生在面對欺凌情境時的心理過程，並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干預和預防欺凌行為的理論基礎。顯示道德疏離可能削弱學生對受害者的同理心，並使其更易採取旁觀或助長霸凌行為，亦說明道德疏離在校園情境中所扮演的深層且多重的影響力。此研究結果對教育現場具有重要啟示，若學生透過道德疏離機制合理化自身的旁觀或助凌行為，將弱化其同理心發展與倫理敏感度，不利於正向校園氛圍之建構。爰此，學校教育應強化學生對欺凌後果的認知，提升其在道德判斷與行為責任上的自我意識，教師亦應引導學生釐清責任歸屬與行動選擇間的倫理界線，避免將不作為視為「合理」選擇。

四、結語

道德疏離機制在教育環境中普遍存在，影響教育人員與學生的行為選擇與

價值判斷。透過認知重構，行為者得以將原本應受譴責的行為視為無害或正當，進一步削弱道德約束力。Bandura 所提出的道德疏離機制，國際上已廣泛應用於教育領域研究中，特別有助於理解學生行為、同理心發展與社會化歷程中的心理運作。當自我調節機制失效時，個體更可能從事違背道德信念的行為。這對於探討教育腐敗具有啟發意義，尤其當教育文化中潛藏的隱性規則使某些行為被視為「可接受的例外」，例如教職員將接受廠商餽贈視為禮俗、目睹他人遭罷凌時選擇噤聲不作為或將被罷凌的責任歸咎於受害者等，實與道德疏離機制密切相關，成為合理化某些行為的重要工具。因此，理解這些心理機制，不僅有助於建立健全的教育倫理文化，更能為教育決策者提供制定政策與預防教育腐敗的實質依據。

參考文獻

- 賴怡君、程景琳（2020）。國小學童同理心與霸凌旁觀者行為傾向之關係：以道德疏離為中介變項。《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21，28-56。
- 胡佳吟（2005）。公務員貪汙犯罪影響因素之研究。《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4，41-82。
- 中央通訊社（2024年4月24日）。中山大學職員盜賣上千張禮券 二審改判2年獲緩刑。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404240141.aspx>
- 中央通訊社（2024年7月31日）。2教授涉收賄助取得學位 高雄某科大：有罪將解聘。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407310248.aspx>
- 中央通訊社（2024年10月22日）。高科大採購弊案曝光 前總務長涉貪遭起訴。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410220112.aspx>
- 陳永鎮（2017）。公務員貪汙犯罪決意影響因素之研究。《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20，113-153。
- 施嘉文（2010）。警察人員貪汙犯罪之研究（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學位論文）。取自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98NTPU0102028%22.&searchmode=basic>
- 余一鳴（2012）。從個人貪腐到組織腐化的歷程探索－以 Bandura 的道德疏離理論為分析架構。《臺灣民主季刊》，9(2)，1-38。

- 余一鳴、顏志龍。（2011）。道德認同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間的調節作用。《教育心理學報》，2，477-498。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90).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W. M. Kurtines & J. L. Gewirtz (Eds.), *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Vol. 1)*, pp. 61-86.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364-374.
- Bandura, A. (2002).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1(2), 101-119.
- Dombrink, J. (1988). The touchables: Vice and police corruption in the 1980'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51(1), 201-232.
- Dunfee, T. W., & Warren, D. E. (2001). Is guanxi ethical? A normative analysi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32, 191-204.
- Gino, F., & Pierce, L. (2009). The abundance effect: Unethical behavior in the presence of wealth.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09(2), 142-155.
- Heyneman, S. P. (2014). How corruption puts higher education at risk.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75, 3-5.
- Kelchtermans, G. (2009). Who I am in how I teach is the message: self-understanding, vulnerability and reflection. *Teachers and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5(2), 257-272.
- Mazar, N., Amir, O., & Ariely, D. (2008). More ways to cheat: Expanding the scope of dishonesty.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5(6), 651-653.
- Miller, G., Miller, V., & Marchel, C., et al. (2019). Academic violence/bullying:

Application of Bandura' s eight moral disengagement strategies to higher education.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31, 47-59.

■ Moore, A. (2008). Rethinking scale as a geographical category: from analysis to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2), 203-225.

■ Thornberg, R., Jungert, T., & Hong, J. S. (2023). The indirect associ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bystander behaviors in school bullying through motiv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mediation analysis.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6, 533-556.

